

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,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—— 四十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



邓小平出访新加坡

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。改革开放,这四个字已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,一代人永恒的记忆。

代表团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,听者无不动容,大呼“石破天惊”

现在的中国人,小学生假期出国游,都已是平常的事了。但是不可想象,40年前中国的大部分高干都未曾踏出过国门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已使我们多年隔绝于世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1978年中央决定派人出去看看,由副总理谷牧带队,选了20多位主管经济的高干,出访西欧五国。行前,邓小平亲自谈话送行,嘱咐好生考察学习。代表团组成后发现,20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出过国。一个是水利部长钱正英,也就只去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,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给配的工作人员。

这些高干出国后诸多不习惯。宾馆等场合到处是落地玻璃门,工作人员提醒千万别碰头,但有一次还是碰碎了眼镜。吃冰激凌,有人怕凉,就有人说:“可以加热一下嘛。”言谈举止,笑话不断。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,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,在世界

舞台上竟是这样手足无措。生活不适应还好说,关键是每天都要脑筋急转弯。出国前脑子里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没落,我们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二受苦的人。但眼前看到的富足,繁荣让他们天天感叹,处处吃惊。西德一个露天煤矿,年产煤5000万吨,最大的一台挖掘机,一天就产40万吨。而国内,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工人,相差80倍。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,职工7000人;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,有6.7万人。我们与欧洲的差距大体上落后20年。震惊之下,代表团问我使团:“长期以来,为什么不把实情报告国内?”回答是:“不敢讲。”

代表团6月归来,在大会堂里向最高层汇报,从下午三点半一直讲到晚上十一点,听者无不动容,大呼“石破天惊”。

“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,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”

1978年10月邓小平又亲自出访当时已是“亚洲四小龙”的新加坡。而这之前我们常称人家为“美帝国主义的走狗”。邓深为对方的成就吃惊,尤其佩服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,便求教于李光耀总理。

李直率地说,你要交朋友,要引资,先停止对别国反政府武装的支持,停止他们在华南的广播电台。

邓回国后断然停止“文革”中奉行的“革命输出”,转而大胆引进外资,改革体制,直至提出“一国两制”。邓的虚心和坚决给李

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多少年后他回忆说:“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,在现实面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己之见。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。”

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眼光

而当时的普通百姓是怎样接触并接受外部世界的呢?

1984年,我时任中央某大报驻省记者,应该算是不很闭塞的人了。一次回京,见办公室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,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的一张绵纸,八寸见方,雪白柔软,上面印着极精美的花纹。大家就考我,是什么物件。当时中国还没有纸中这个词,也没有一次性这个概念,我无论如何答不上来。

那位记者说:“这是人家公共厕所里的擦手纸。”天啊,我简直要晕了过去。“老外这样的阔气,又这样的浪费呀!”我把这张纸带回驻地,给很多人传看,无不惊得合不上嘴。

不久,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,飞机上喝水用一种硬塑料杯,晶莹剔透,比玻璃杯还漂亮,喝完便扔。但我觉得实在是一件艺术品,舍不得扔掉,把玩许久,一直带回国内。喝茶时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,喝咖啡时又是另一套咖啡具。机上走廊很窄,空嫂来回更换不厌其烦。该送咖啡了,我嫌面前小桌上的杯盘太多,也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着想,便将空的茶杯递了过去。不想这位洋大嫂用吃惊、鄙夷的眼光,深深地瞪了我一眼,那潜台词是:“你这个中国土包子!”我一时羞愧难当,永远也忘不了那个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眼光。

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

当中国十年冰冻的体制、停滞的生产力受到外来信息的吹拂时,一切守旧的思想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慢慢融化。责

任制、承包、下海、商品经济等,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灵般地在人们身边徘徊,最后聚成了一个时代大潮。而一批时代的弄潮儿也就出现了。

1980年春,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还未撤销。我到山西西台山下的小村庄里采访一位奇人。他在“文革”前即考上清华大学,却因出身不好,被退回乡务农。他躬耕于农亩却不改科研的初心,自学两门外语,研究养猪技术。公社猪场连年亏损。改革春风稍一吹动,他便带上自己的一个小存款折,推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,说:“我愿承包公社猪场,一年翻身。如若不能甘愿受罚。口说无凭,立个军令状,以此相押。”说罢将存折“啪”地一声,拍在桌子上。书记也豪爽,说:“如若有失,你我共担。”结果这个猪场一年翻身,大大盈利。

这篇稿子见报后,一个月竟收到5000多封来信。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的农民络绎不绝,他就借势办起了养猪培训班。当地破格将这个农民转为国家干部,又直接任为科委副主任。科学的春天、政治的春天一起到来了。那篇新闻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。那时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想什么?强烈地想摆脱贫穷,要发财致富。本来经济发展就是如河水行地,利益所驱,自通有无。这一招,早在春秋时的政治家管仲治齐就大见灵验,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也大得其利。在一段时期,我们搞社会主义,却弃之不用。当时国家供应短缺,农民卖一点自产品却要摊、要抓、要罚,人为地制造穷困。

随着气候的变暖,开放集市的呼声愈来愈高。报上只是试探性地登了一条四指宽的“群众来信”,却弃之不用。农民赶集时将这张报纸挂在扁担上作为护身符。冰

冻十年的市场,哗啦一下,春潮澎湃。

历史证明,国门打开多大,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

马克思说:“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信息,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。”古今中外,历来的改革都是先睁开眼睛看世界,从对比中找差距。当俄国农奴制走进死胡同,彼得大帝发起改革,组织庞大的出访团巡访欧洲,而他自己则化装为一个普通团员随团学习。清末,当中国封建社会已千疮百孔,感到不得不改时,也于1866年派出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。西方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吹入国内。然而,近代以来中国对外的国门总是时开时闭,思想也就一放一收。

历史证明,国门打开多大,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。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开国门,思想解放,直接导致后来新中国的成立;1978年以后中国人再次睁开眼睛看世界,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,直接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现。 □梁衡

■钩沉



谷牧出访西欧

现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过教书经历,只是时间长短的差别而已。

在学生的眼中,俞平伯“秃光着脑袋,穿着宽大的衣服,走起来蹦蹦跏跏的,远远看去,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和尚”,朱自清“矮矮胖胖的身躯,一方方正正的脸,配上一件青布大褂,一个平头,完全像个乡下土佬”。学生都是颜值控,总喜欢对教师的长相以及穿衣打扮品头论足。无论是作为名诗人的俞平伯,还是朱自清,都难逃学生的“法眼”。作为剧作家的曹禺,也难逃这一“劫”。在学生石挥的眼中,曹禺“不爱修饰,矮小的身材,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,要不是有一双敏锐充满神采的眼,你说不定会猜他是小商店里的朝奉”。

曹禺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,“但是,当时保定的育德中学请我去,每月大洋180元,比助教高,助教才几十元,育德看中了我……在育德呆了3个月便得了痢疾”,于是他回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。曹禺得的是“心病”。郑秀回忆,“曹禺从保定回来,又读清华研究生,因为我当时还没有毕业,他是在等我”。曹禺的老同学孙浩然回忆,“曹禺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去教法文,教了半年,他就受不了,一是觉得那里太荒凉,二是离不开郑秀。他在保定几次跟我写信,说那里呆不下去,太荒凉,要回北京”。曹禺虽然在育德只呆了3个月,但对他来说也不无意义,他晚年接受采访时,曾发过这样的感慨,“我在保定的育德中学教书,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,但是很特殊的。也许是我人生的一个交叉点。如果我在保定留下来,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命运。育德这是地下工作者很多的一所中学……”

1934年曹禺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,“杨善荃介绍我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任教,当时,李霁野是系主任,人很好,很正派”,“我住的房子很小,在楼上,一间一间的,住的都是教师。房间的摆设简单极了,一个平板床,一个书桌,一把椅子。李霁野先生同我住在一起。霁野的夫人,是我的学生”,“我有时回家看望母亲,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里。我教英文,教点《圣经》,还教点法文,也教莎士比亚,教西洋小说史,还教点法文,从字母教起。什么都敢教。那时年轻胆大,什么课都敢接”,“《日出》最后,工人唱的夯歌,是我把工人请来,就在师范学院里,我把陆以循也请来作记录。工人唱着,我记录下来,稍加整理,就谱写出来了”。不单可以大胆地开课,还有助于自己的剧本创作,但曹禺1936年还是选择了离开,“天津呆不下去了,气氛不好。那时天津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,三九天披着麻袋片,饿殍遍野,



曹禺的教书生涯

于足决心离开天津”。

1936年8月,曹禺应余上沅之请到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任教,讲授《西洋戏剧史》《剧本选读》等课程。汪德、蔡极在《辞家巷杂忆》中回忆他们的曹禺老师,“他一上来就担任理论编组组的主任,他既聪慧又勤学,在教课时对世界名剧如数家珍,很多莎士比亚、易卜生的名作中的名句能非常流畅地以英语背诵下来。对世界名剧的分析详尽而精辟,至于惊奇、暗示、悬念、偶然、必然、等待、意外与意内等等编剧技巧的运用,也都生动地举例,使同学们易于领会”。曹禺了解到学生缺乏舞台经验,特意将喜剧院借比希的《迷眼的沙子》改编成适合中国风土讽刺剧《镀金》,并指导学生排演,饰演大夫家亲家的石羽在《记忆犹新》中回忆,“万老师(曹禺)在排《迷眼的沙子》时,将译文一句一句念给学生听,征求意见,共同探讨;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作者的意境,了解人物的心态。这样,排起来,对剧本有如指掌。万老师把编剧、导演、表演融于一体的授课方法,我们获益匪浅”。

1938年2月,国立戏剧学校迁至重庆,曹禺出任教务主任。1939年4月10日,曹禺随剧校迁至江安。石挥以笔名英梧在1941年2月10日出版的《剧潮新闻》第10、11、12合期写有“内容笔调均甚优美”的《曹禺在古城一剧校回忆录》,深情回忆了在剧校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给他较深刻印象的曹禺,“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,但并不是不会讲话。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。他的课程,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,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、西洋戏剧史、剧本选读、编剧方法。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,是他的‘剧本选读’,可以说,他简直不是在讲课而是在演戏。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,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,用动人的语句,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,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。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的时候,他能将学生自由地地带入他所讲的世界与生活中,千百个心变成一个心,与剧中人同甘苦、同纵放、同欢笑、同郁闷、同忧伤。全课堂一点声音也没有,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,也沉重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。我们甚至于爱听他的授课,胜于捧读他的作品,我们往往自己费两天工夫细读一部名作,只能接受一两段动人的情节,三四句有名的‘悲词’,而那不易深切体会的伟大作品的精髓,每每经他一两句精湛的评语,而获得深刻的认识”。蔡骥在《记万先生的教学》中也提到,曹禺“最有名的课是‘剧本选读’。在剧校开设的各种专业课中,这门课听座率第一。每逢上这节课,学校内外大批听众——其中包括来自重庆沙坪坝大学区的学生和重庆市内的戏剧工作者,都按时前来听课,课堂经常爆满”。1942年夏天,曹禺为了专心从事创作,离开剧校。新中国成立后,曹禺还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。

曹禺不单是著名的剧作家,还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,因此他在讲授“戏剧选读”等戏剧课程时,边讲解边表演,带着学生一起融入剧作,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,把他们的智光点燃”(郭沫若《女神》)。曹禺在现代戏剧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他在现代戏剧教育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。 □富立

■人物春秋

难忘“快桌”

“吃饱喝美,不醉不休!”这一下坏了,快桌乐队的一个没醉,男舞蹈演员却醉倒一片。到晚上几个节目演不成了,调换节目也凑不够时间,看来只能乐队朝上顶,补窟窿了。快桌桌长不愧为大将风度,急中生智,三菜,按定量还不够吃,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们,那是难得的盛宴。相当于给嘴过大年,那热烈之场面,比农村过会则有之而无不及,如同上演了一部群起而“吃抢食”的情景大戏。

于是,一些食量大,能吃海喝的就自动形成了一个桌,被称为“快桌”。基本是十个人,有一两个候补。他们中的骨干每个人都被封了一个绰号,例如:“七把叉”“一扫光”“风卷残云”“猛吃海吃”“统统都吃”“铜肠铁胃”等。他们自己还给快桌总结出几句口诀,“近台快攻”“双臂架桌”“斜抄横喂”“夹到碗里先占上”等,还有“集中全力打开歼灭战”,这时的目标是肉,什么“条子肉”“红烧肉”“粉蒸肉”“苜蓿肉”“狮子头”“四喜丸子”,再是“红烧牛肉”“红烧羊肉”“葫芦鸡”“辣子鸡”等等。其中遵循的是“先荤后素”以及“先吃肥的后吃瘦”,即上了肉菜要先吃肥肉后吃瘦肉,和今天正好是反着的,当年缺水,肥肉比瘦肉珍贵,甚至不少人说瘦肉如柴。

“快桌”成员由乐队组成,头把交椅的桌长自然是乐队队长,这家伙个头高,胳膊长,嘴大喉咙眼粗,货真价实的饕餮之徒。开席时由桌长发号施令,他先把一个个如饿狼般的快桌成员伸出的筷子一敲打回,然后迅速刁住一块肥肉,才喊:“一二,开席!”“快桌”之快,难以想象。一次慰问一驻地部队,下午晚饭后部队首长举杯祝酒词方落,开席仅几分钟,快桌已以雷霆之势,如风卷过,把一桌子肉菜一扫而光了。我们歌舞团团长陪同首长一桌桌敬酒,行至快桌,只见碟空盘净,残渣剩水,一片狼藉。闹得我们歌舞团团长尴尬万分,惊叹一声:“完了!”部队首长却哈哈一笑,一边对我们团长说:“哎呀!你带的人马,有我们部队的作风,好啊!吃饭和打仗一样!”一边忙招呼给快桌加菜,还大声朝饭厅其他十几桌子的嚷道:

会餐,团部把分桌名单贴在墙上,又有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,在不少女演员名字下留言,说谁谁是“能吃”,说谁谁是“海吃”。还有“揍眼”“食吃”“大嘴”“吃得美”“大肚皮”等,说这是挑选“铜歌”女快桌呢。谁料竟把几个脸皮薄的小女子气哭了。哈哈!这也算“快桌”唯一惹的祸吧!

快桌伙计的就是桌长,这家伙平日最爱吃会吃,是个标准的美食家。记着有一次他从家中带到单位午饭盒切好用香油调拌好的香肠,给我们乐队几个打牙祭,一人分了两三片,我放到嘴里慢慢品尝着细嚼,香得不得了,舍不得咽。过了半天,我买了一斤香肠,如此照办,擦眼得迫不及待就朝嘴里塞,猛啜起来,可吃了一半就想吐,从此再不爱吃香肠了。桌长这家伙如今官当得忒大,说出来唬人。

我这可不是编故事,一切都如在眼前。我乐队吹长号的张渭笑后来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,他撰有《铜歌文苑,梨园奇葩》:桌长一声口令“啞!”九名桌员齐刷刷地弯腰伸筷,恰如九片花瓣合拢……人快桌,似打仗,毛主席“集中优势兵力”教导要牢记。锁定目标,重点进攻。稳准狠……

当年快桌“吃抢食”,吃得香,如今回忆起来全变成乐事笑谈了。张渭笑说得好:“快桌之意不在食,嬉戏抢食,不拘小节,恣意汪洋,图的是个痛快,尽兴。故快桌之快,在于快乐。”

啊!我们的“快桌”,叫人难忘! □朱文杰

■往事

全团工会电子图书陕西工作站
联系人:王坤 13892828206 18629418319
联系地址:陕西西安理工大学图书馆2205室

《全团工会干部培训基础教材》(2018版)
作者:李玉斌 主编
出版社:中国工人出版社
定价:430.00元(14本)
出版日期:2018年5月第1版